



伤人事件屡屡发生,数量不断增加

# 谁来管管城市流浪犬?

“疯狗已咬伤多人,请大家互相转告,并注意安全!”6月中旬,湖北通城一条提醒疯狗咬人的消息在网上广为流传。当地疾控部门称,先后有20多人被咬伤。多名民警携带网枪、警棍等设备在城区搜寻,最终在市民的配合下将伤人犬只进行了处理。

这并非个案。近来,多地频曝流浪犬伤人事件,引发公众关注。“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相关法规、措施落实不力,管理手段滞后,随意弃养犬只的行为屡见不鲜,一些地方流浪犬数量出现明显增长势头。

## 感到厌烦随便丢弃,流浪犬数量明显增加

记者在长春、武汉、重庆、南昌等地走访时发现,一些人口稠密、环境相对较差的地方经常出现流浪犬,有些流浪犬被周边居民定时投喂。

由于很多城市都没有真正落实宠物犬登记制度,因此,宠物犬的数量无法统计,流浪犬的数量更无从知晓。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

会长杜帆介绍,协会做的一个调查抽样显示,仅武汉一个城市,市民养的宠物犬估计有数十万只到百万只。

多位动物保护人士说,饲养宠物没有门槛且实际登记率低,养犬成为很随意的事。有的人高兴时抱回一只,感到厌烦时就随便丢

弃,流浪犬的数量日益增加。

南昌市犬只留检所负责人胡志强说,所里有300多只流浪犬。目前,当地加强了路面巡逻力度,每天三台车在全市巡逻,被收容的流浪犬数量以每周10多只的速度增加。

据悉,在苏州市公安局下辖的

6个犬类留检所,自2016年以来留检犬只共63125只,其中相当一部分为流浪犬。

重庆民间爱心人士杨玉华介绍,她参与创办的救助基地现共有1100多只流浪犬,仅今年前5个月就救助了100多只。由于流浪犬数量太多,基地爆满,目前正在扩建。



## 对弃养者难以追责,收养费用负担沉重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出台了养犬管理规定或条例。北京、上海、辽宁等地出台的养犬管理规定或条例明确,不得遗弃所养犬只,否则要承担相应责任。但这些规定并没有阻止流浪犬数量不断增加。多地公安民警表示,由于缺少线索和证据,除非主动现身,否则很难找到流浪犬的主人,更无法追究其相关责任。

据悉,目前的流浪犬中,除了小部分是繁育出来的“二代流浪犬”,大部分都是被弃养的。流窜

在城市角落的流浪犬多数有伤病,其中瘦小或残疾的流浪犬大多长期生活在垃圾堆附近。

另外,走失也是流浪犬增多的重要原因。在一些居民区,记者看到,不少养犬人士并不给犬只拴链绳,任由它们在道路或小区乱跑,走失风险很大。有的犬主人称,不拴绳是不想让宠物感到束缚。当然,同时也是觉得牵绳不方便自己活动。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流浪犬中不乏大型犬甚至烈性犬。记者在

长春、武汉、重庆等地发现,在一些闹市区和花鸟鱼市场,有不少大型犬和烈性犬的幼崽在出售。在相关网络论坛和交易网站上,不少人大肆买卖烈性犬幼崽。动物保护人士称,饲养大型犬、烈性犬违背相关法规条例,且成本高,很容易发生弃养,并导致病犬伤人。

流浪犬不断增加,政府收容、喂养的负担也越来越重。苏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郭文华介绍,苏州市区的一所犬类留检所,除场地租金和人员工资以外,

每年包括狗粮、消毒等在内的日常维护费用约20万元。一些动物保护人士告诉记者,不少民间收养救助基地都是志愿者筹钱甚至借钱运营,维护运营成本很高。

目前,北京、南昌、苏州等地已经启动市民领养流浪犬制度。南昌市犬只领养窗口自今年1月21日开放以来,有64只流浪狗被领养,其中幼犬20只。不过,市民领养流浪犬大多看重品种与颜值,往往愿意选择金毛、哈士奇等名贵犬收养,普通流浪犬乏人问津。

## 强化饲养法律责任意识,倡导公众多领养少买卖

在苏州、长春等地,公安机关和社区物业等多部门采取发放告知书、免除相关收费等措施,呼吁公众提高依法文明养犬意识。

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应完善小动物保护相关法规,进一步强化责任追究,减少弃养等行为。

通过科技手段提高管理能力,减少不负责的饲养,也是有关部门努力的方向。从去年开始,苏州给登记办证的犬只身体内植入芯片。芯片上有主人和犬只的信息,宠物即使丢失也能快速找回,同时

可有效防止弃养。

南昌市流浪犬民间收容基地、益善爱护动物协会会长李兰说,救助机构可与宠物医疗机构合作给宠物做绝育手术,减少流浪犬数量。

杜帆说,一些民间社会组织可以承担流浪犬收容、喂养等职能,有效弥补地方相关部门资金有限,设施不完善和规模不大等短板。因此,可以探索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流浪犬的处置。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朱国亮、程迪、梁建强、柯高阳、杰文津、刘硕、徐俊

# 崖壁上绽放的缫丝花

## ——记贵州乡村教师杨绍书41年坚守见证苗寨变迁

清晨的哈冲,浓雾笼罩,崖壁上的小花迎着朝露竞相开放,清新烂漫。当地人称这花为缫丝花,其性耐干旱、耐贫瘠,生命力极强。崖壁之上,花木之间,隐约可见一条崎岖的“毛狗小道”,这是寨里娃儿上学的必经之路。这条路,57岁的杨绍书已默默守护了几十年。有41年教龄的杨绍书和这缫丝花一样,亲历了哈冲的贫困,又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山村教育的沧桑巨变……



在贵州省黔西县金兰镇瓦房村,杨绍书(后)和学生们在崎岖险峻的小路上行走(4月27日摄)。

## 崖壁坚守

第一次见到杨绍书是在4月底的一个清晨。已洗漱完毕的他,正坐在屋外的一片石磨上抽旱烟: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身着黑色夹克、洗得发黄的白衬衣、黑色光面西裤,脚上是已磨掉皮的黑皮鞋。

贵州省黔西县金兰镇瓦房村哈冲组位于乌江上游支流六冲河岸的一处崖壁上,从河面向上或从崖顶向下很难被一眼发现,除非偶尔升起的炊烟和石头缝里冒出的庄稼苗。寨子里的老人说,祖辈为避战,逃到了“挂在半空、面朝河谷”的哈冲。

老杨的家位于寨子的最高处,是上世纪70年代建的一栋平房,墙是泥巴垒的,发黑的茅草屋顶长了不少青苔。这,是他教师生涯开始的地方。

1977年,因为娃儿外出上学困难,在公社的支持下,寨子里唯一上过初中的、会说汉语的杨绍书在自家堂屋办起了“识字班”。

当时年仅16岁的他,比班里的大娃娃大不了几岁,“工资”按一个

壮劳力算,一天记12个工分。

老杨回忆,当时教室很简陋:几块木板拼接刷上墨汁就是黑板,课桌是各家凑的长条板凳,9个学生按年龄分段分了3个年级,一个年级上课其他两个年级只能背对讲台自习。

1981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到金兰镇,老杨也转为民办代课教师,报酬从工分变成了工资。1987年,为方便村里更多的娃儿上学,老杨的教学点搬到隔壁的瓦岗二组。1996年,教学点并到村里的华山小学。

从哈冲组到瓦岗二组和华山小学,都必须翻过悬崖,荆棘密布,之间只有一条狭窄、崎岖的“毛狗小道”。这条小道原本也是没有的,是老杨带着村民一刀一刀砍、一镐一镐凿出来的。

从崖底出发到崖顶稍宽敞的土路,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却要爬近50分钟。小道弯曲起伏,不仅要小心脚下随时可能松动滑落的石头,还得提防偶尔出现的毒蛇、野蜂。

途中处处凸起的山包,人称“船

头山”,创出的小路几乎与江面垂直,徒手攀爬极难,当地人用自制的“树钩”钩住头顶裸露的树根或石头缝才能往上爬。

每至此处,孩子们只能靠老杨一个一个往上背,一个一个往下抱。多的时候有10多个孩子,一口一口气抱下来,老杨经常累得气喘吁吁。

为了确保安全,老杨会定期带上锄头和镰刀沿路除杂草、刨石梯、搭藤索。“秋季学期砍一次就可以,春季学期草木长得快,每隔一两个月就要砍一次。”

“夏天温度高,娃儿走到学校都累蔫了,雨水还多,有几回小路直接被山洪冲得不见踪影。”老杨说,“冬天也不好走,天亮得晚黑得早,来回都得打着电筒。”

“说不累是假的,习惯就好了,每学期开学的头10天走得还是恼火,腿肚子又酸又痛,但走半个月就又适应了。”

年复一年,老杨就这样“抱”大了一茬又一茬苗族娃儿,走过的崖壁求学路总里程可绕地球一圈。

## 闯关出山

老杨是哈冲第一个迈进中学大门的,也曾是哈冲最有希望、最先走出山门的人,但为了更多的人能走出去,他选择了留守。

隔山断水,让哈冲与世无争却又世代穷困。虽然哈冲的黄姜和土猪在当地都是“抢手货”,能卖钱,但“姜不敢种太多,猪也不敢养太肥”。因为姜多了没劳力一趟一趟往集市上背,猪也会因太肥爬不上山路,出不了寨门。即便是到了集市,村民也往往因“不识汉字、不会汉语”无法和客商沟通。

对于哈冲,摆脱贫困只有“出山”一条路且须闯过两道关:陡峭崖壁、语言不通,而后者无疑更艰难。老杨的双语启蒙无疑给了哈冲人“出山”的底气和勇气。

41年里,老杨教过的学生近400人,他最高兴的是“寨子里的适

龄儿童没有一个在小学阶段失学辍学的,绝大多数娃儿都能上初中、都会说汉语”。

在教学点,老杨是“全职”,既教语文也教算术,既教汉语也教苗语。后来在华山小学,老杨也是学校唯一一个一边用汉语讲课、一边用苗语翻译的老师。

“读书识字对这里的娃娃太重要咯。”哈冲村民小组组长杨子贵庆幸自己儿子都是初中生文化,也因此在外谋份生计。“多亏了杨老师,娃儿们出去打工不再是‘瞎子’和‘哑巴’。”

“不是杨老师,我话都说不利索,根本出不去,出去了也不能安心在外打工。”今年28岁的赵江华和爱人常年在福建的一家食品厂打工,留守在家的两个女儿平时上学、放学都由老杨接送照料,“这些本是我们当爹妈应该做的”。

## 搬进县城

今年5月起,哈冲组15户村民陆续搬到了城关的“锦绣花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6名适龄儿童也将在下学期就近入读黔西县第十小学,老杨被特聘为该校的苗汉双语辅导员。

外出打工是杨绍书的儿女辈“出山”的特有方式,在当时也算得上是最理想的出路。但老杨认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走出山门。

因为大多数人都“出去打工——挣钱攒钱——回家盖房娶媳妇”,最后又都回到了山里,又种起了玉米养起了牛,唯一的改变是房子从崖底河谷搬到了崖顶的公路边。

“这回搬到城里,是真的走出来了,娃儿们可以往大学想了。”杨绍书认为,这一轮的易地扶贫搬迁是哈冲人出山“千载难逢的机遇”,而受益最大的是孙子辈,“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有机会考更好的学校”。

老杨说,从教40多年,最大的遗憾是没有教出一个大学生,最后能上高中的也是寥寥无几。这些年村里教育的条件改善了不少,义务教育阶段基本上不用花钱,小学每天还有营养餐,但“教学水平还是跟不上,大多数人家的经济条件也都无力供娃儿上高中”。

“在哈冲,娃儿来上学要花费近4个小时,放学回家还要放牛、割猪草,搬过来之后,走路上学最多半小时,回家就可以做作业,算下来每天可以多出至少3个小时的学习时间。”

“老杨是我们的榜样,也是学校的宝贝。”黔西县第十小学校长赵彤告诉记者,该校今年预计将接收近千名搬迁过来的学生,其中有不少是苗族孩子,但现在学校40多名老师无一人会讲苗语,“跟学生和家长的沟通可能会出现”。

进了城,再送一程。老杨很看重双语辅导员这个岗位,他希望能

够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为更多从大山里搬出来的苗族娃娃尽快融入新环境、适应新生活贡献一份力。

坚守41年,很多人不理解:“当了几十年老师,新房子都建不起,到底图个啥?”

“我就喜欢别人叫一声‘杨老师’。”老杨常说自己是个“幸运儿”——初中没毕业能当老师到现在,能带这么多学生。

“当初能当老师办‘识字班’是沾了‘会说汉语’的光,现在能进城当老师是沾了‘会说苗语’的光。”老杨半开玩笑地说,“说到底还是沾了党和政府的光,没有国家对山区教育的重视和扶持,哈冲不会有现在,也不会有未来。”

老杨是个典型的苗族汉子,憨厚老实,没有多少豪言壮语,但“嫩竹高过母”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希望哈冲的后生一代比一代强,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潘德鑫、欧东衢